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西方国家的全球问题学派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

84

0255

西方国家的全球问题学派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编辑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0.625 字数: 12千字

1984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全年出版40期 总定价: 12元

0255

西方国家的全球问题学派

〔苏〕Г.С. Хозин

全球问题的出现和激化，不能不引起资产阶级学者的关注。早在六十年代末期，几乎所有著名的资产阶级哲学政治思想流派都在不同程度上谈论过某些最尖锐的大规模过程和现象。全球学是把这些新问题作为统一体系加以研究的资产阶级科学的独立分支。但在当时它还处于形成阶段。没有统一的方法论，难以揭示和全面分析加剧全球问题的现实社会经济前提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手段和方法。这特别明显地反映在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的全球问题的分类中。

资产阶级学者常常把新的危机现象，即威胁资本主义的那些“挑战”或危险归属于全人类，因而称之为全球问题。在一种有影响的美国刊物——美国科学发展促进协会机关刊物中指出，“全球问题系指世界所有国家或几乎所有国家都受到实际影响的问题，而各国或者是全球问题尖锐化的主体（损失的根源），或者是损失的客体，抑或同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

资产阶级学者从一开始就把全球问题的尖锐化同“不可控的”技术进步的不良后果的加剧混为一谈。正是在这

本文作者是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研究人员

个基础上美国学者提出了最早的一种分类。他们认为，在七十年代初，“被提到首位的技术戈就是：1）能源的大规模生产及其价格的降低；2）借助人造地球卫星发展全球规模的远距离通讯；3）海洋资源的开发；4）天气预报方法的改进和改变气候可能性的扩大。”关于这些成就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则需具体分析。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人类遭遇的危机形势及限制其规模与形态的可能性一览表是编制全球问题（俨然仅由技术过程产生的）早期分类尝试的代表作。美国未来学家戈登提出的一种分类表（参见表1）如下。

表1 划为“全球规模危机形势”的全球问题

危机形势	评价标准					
	涉及的 人数	影响 程度	产生的 机率	改变事态 进程的 可能性	责任	国家评价 和可能采 取的对策 的可靠 程度
核战争	很多	非常大	很小	可能	不明确	中等
粮食奇缺	很多	非常大	高	可能	不明确	高
生物圈质量恶化	很多	中等或 颇大	中等	困难	不明确	不大
物资福利分配不均	很多	颇大	很高	很难	没有	中等
能源和原料短缺	多	中等或 颇大	很高	很难	没有	高

美国梅尔菲委员会研究国际局势变化条件下对外政策的重要课题，全球问题也纳入了它的报告。报告中指出：

“防止军事威胁是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但国家安全有可能受到政治-军事范围以外的事件的威胁。北极积冰融化、臭氧层耗尽、放射性生产废料漏泄或世界人口不断爆炸性增加，这些也象传统的军事-政治领域发生的事件一样，都可能成为美国（或其它国家）人民安全的严重威胁。”

资产阶级学者的首批著作之一——斯柯尔尼科夫著《国际工艺最高命令》一书，其中全球问题占有很大篇幅，该书並试图对全球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分类。作者不仅把全球问题分成若干组，而且试图阐明使各组问题尖锐化的特定前提：1）新技术对自然环境的影响；2）新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用（世界海洋的开发和宇宙空间的利用，动力学的综合发展，遗传工程）；3）在科学技术革命现阶段特别尖锐的“传统的”问题有：天然资源枯竭、粮食不足、人口增长、滥用药物和麻醉品、“技术资本主义”（指技术援助和把科技成果转让给其它国家，首先是发展中国家）。

1975年7月，亨利·基辛格就全球问题这样陈述过美国政府的官方观点，他说：“我们在地球上的相互依赖正在成为我国外交的中心因素。能源、资源、环境、宇宙和海洋的利用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正反两方面的后果都已超越国家的界限。它们将给后代埋下政治冲突的种子……”

著名的美国科学技术革命及其社会后果问题专家布鲁

克什提出了一套独特的全球性问题标准。根据这些标准，首先应列为全球、全人类问题的是：在保持现有趋势下，社会和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只有在国家承担大量费用的条件下改变现有趋势的可能性；如果政府在这方面的立场不变，不良后果进一步加剧的必然性；由于实现全球问题的缓和或防止其尖锐化的计划而取得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上述措施对许多国家的积极作用或由于这些矛盾的激化而造成的巨大损失；由于共同解决这类问题而使冲突关系变成合作的可能性；在解决某一全球问题的过程中，在实现经济和技术相互依赖原则的情况下，国际劳动分工的积极结果和某些国家主权受到侵犯的可能性。

在七十年代后半期，资产阶级学者对全球问题的解释有了一定的进展。西方一位研究全球问题的著名学者——《最可能出现的世界》和《人类应有的研究》两部书的作者蔡斯提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单独解决的问题是全球问题。这些问题是：裁军；限制人口爆炸；防止世界海洋污染和合理利用世界海洋资源；防止大气污染；防止水土流失；建立平衡的动力工程；经济地利用矿物资源；开发宇宙；建立有效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发展运输（首先是空运）和通讯；保障居民的健康；协调跨国公司的业务。这个全球问题的清单，总的来讲，客观地反映了形势。

必须指出，七十年代后半期在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中出现的许多全球问题分类的一个重要的积极因素，就是提出了限制军备和裁军问题。其中，美国学者布朗认为全球

问题是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力量具有征服全人类的危险。他把下列问题列为全球问题：人口的迅速增长；人类对粮食、能源和原料需求量的增加；天然资源枯竭；环境（包括气候）不断恶化；技术进步突飞猛进；“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直接保护主要强国而间接威胁全人类的“核保护伞”的威胁不断加剧；地球上新式武器迅速扩散；城市高速发展；复杂的工业社会由于国内外的不稳定而更加脆弱。

1980年美国出现了综合研究。它是根据卡特总统的指示完成的，其目的在于“不仅要研究到二十世纪末地球人口发展，自然资源和环境状况的可能变化，而且要为长期规划奠定基础”。由14个政府部门的专家对全球问题主要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其中包括：人口、各国人均收入、食物、土地资源、能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生物遗传资源、水资源、大气质量。可以看出，其中并非所有问题都属于全人类问题，而它们之所以被列为全人类问题是出于纯实用的目的。“未来资源”公司的经济学家们也完成了一部著作，他们完全从美国的狭隘民族利益出发，分析了直到21世纪前25年矿物原料、生态和人口等问题的各种发展方案。

这两项研究的内容又一次证明，资产阶级全球学不能客观地和全面地分析当代全球问题尖锐化的原因，不能提出多少切合实际的，为全人类的利益解决全球问题的途径。

许多资产阶级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往往轻视全球问题的

全人类性质，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制订一些狭隘的实用对策上，这些对策只能首先部分地缓和资本主义国家中全球问题的尖锐程度，並吸收其它国家参与解决那些明显威胁资本主义国家“民族利益”的问题。

全球学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领域也有它自己的结构。其中包括各种学派和从各种角度观察全球问题的理论流派。他们认为全球问题产生和尖锐化的原因不同，提出的解决途径也不同。积极从事研究这些问题的不仅有美国的科研机构，也有西欧、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

“技术决定论” 这个流派的拥护者所持的出发点首先是：科学技术进步恰恰是引起全球问题尖锐化的主要原因。同时，他们断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可使人类有效地解决对现在和未来都迫切的全球问题。美国和欧洲学者所持的观点各不相同，他们的许多著作说明资产阶级全球学的这个流派的发展情况。在他们当中，有“无限的”乐观主义者，如卡恩、维涅尔、布朗、马特尔等；有“温和的现实主义者”，如福尔克、杜博等。

作为“技术决定论”流派创始人之一的麦克赫尔描述了出现全球问题的前提：“局部问题不再存在……，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和互相依存的世界集团的关系很少表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更多的表现在科学技术领域内新事件的影响方面。”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技术决定论乐观主义”

最明显地表现在各种技术进步预测方面，这些预测的主要目的在于以不同的可靠程度表明实现最重要的技术成就的时间，包括实现军事技术发展中“质的飞跃”的时间。

七十年代后半期，他们开始提出，技术发展已经成为一个能引起复杂后果的矛盾过程。但他们认为今后几十年技术进步将给社会提供有效的手段去解决已经激化的大小矛盾。古德卓诺夫研究所的著作《今后200年》可能是七十年代后半期“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观念的典型例子。书中提出了今后200年人类发展的两个方案（当然还保持着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旨在加强利用地球资源的“地心”方案和为了更积极地利用宇宙空间（包括建立轨道居民点）的宇宙方案。

美国学者描绘了今后100年世界可能发展的若干方案。这些方案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资产阶级全球学其它流派的观点（参见表2）。

在“技术决定论”流派的代表中，不仅有“乐观主义者”，而且有温和派和“悲观主义者”。还在七十年代初，斯柯尔尼科夫就以现实主义态度估计了技术发展的趋势。他写道，彻底揭示技术进步的后果是不可能的。但是，他确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后果将迫使国际关系体系发生重大变化。

在谈到“技术决定论”众多流派代表人物的观点时，不能不指出，其中一些人得出了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的和几乎是技术万能的结论，即夸大了资产阶级社会利用技术

表 2 人类在今后100年可能的发展状况的基本特征

发展参数	新马尔萨斯主义模型	温和悲观主义模型	温和乐观主义模型	在科学技术成就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模型
资源、技术、劳动力的保证程度	资源枯竭业已探明	可开发的资源数量不明	可开发的资源数量随着科学进步而增加	资源无限,其中主要要有:资本、技术、干部
技术和资本决定的通过和实施	可能性渺茫或无益 几乎注定失败	将减少 可能失败	将增加並保证发展部分有效	将解决一切问题 不是严重问题
矿物-原料基地	不可逆地枯竭	问题继续存在	基本够用	技术经济进步导致最佳决策
经济增长特性	自我毁灭	造成灾难的前提越来越无效	稳定是可能的 一般有效	理想的和有益的希望是人类最大的希望
新技术设施和科学发现	把社会带进死胡同,无助于进步	危险地加剧	贫困和绝对水平降低	问题表述不当
收入不均和贫困	有增无已和必然导致悲惨结局	后退一步	应该继续下去	繁荣和进步所必须的
工业发展	通向灾难的前提	导致灾难	可能是良好的	乐观的,对将来充满信心
长期远景	暗淡和失望			

成果改良社会的可能性。例如，美国学者布尔斯岑甚至断言，广泛发展电视“有助于解散军队，免去总统职务，建立崭新的、甚至以前在美国梦想不到的完善的民主秩序。”另一位美国学者、研究太阳能技术潜力的积极拥护者海斯在论证优先发展技术进步的这个方向时提出的证据是值得怀疑的，他的证据是：“广泛建设核电站必然导致社会走上专制制度。只有在极权主义的国家才有可能发展核动力作为主要的能源”。同时他认为：“分散的太阳能比集中的能源生产潜力更能同社会平等、自由和多元文化并存。”

承认和支持“零增长的观点”（向罗马俱乐部所做的第一个报告的基本结论）的拥护者们代表了“技术决定论”的极端悲观主义路线，“有机增长”观念（向罗马俱乐部所作的第二个报告）的拥护者也参加了这个行列。

最后应该指出，“技术决定论”观念演变得特别快。它常常随着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成就的出现而得到修正和补充。对这些发现和成就，不仅应从其功能效果方面，而且应从其对解决当代全球问题可能做出的贡献方面来评价。由于这种状况，有理由把从事开发宇宙和世界海洋的科学技术和政策、生态、能源、矿物原料、人口和粮食“技术”、保健、气候和气象等问题的研究人员列入这一流派。

“后工业社会”流派 1963年出版的W. 罗斯托的名著《经济增长各阶段》可视为后工业社会流派独出心裁的理论信条。这部著作还有一个耸人听闻的副标题《非共产党宣言》。作为资产阶级哲学-政治思想流派的后工业社

会的辩护者中还有闻名西方的 A.托夫勒、D.贝尔等。在他们的著作里，全球问题并非主要研究对象，但他们的理论学说却把采用外推法对“工业资本主义”自身发展中错综复杂矛盾的未来进行预测提供了依据。在七十年代初期，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家们开始谈论：涉及大多数国家利益的全人类问题业已出现。他们判断，全球问题可以在社会向更高阶段，即“后工业社会”发展阶段过渡的过程中顺利地得到解决。

例如，贝尔赋予“后工业社会”下述几个特征：由商品生产转向“服务经济”；提高“技术决定论者”——职业革命家在社会中的作用；提高理论知识（包括社会知识）的社会意义；对技术发展实行更严格的社会监督；更广泛地利用电子计算机和其它种种“智能技术”。同时，他还显然力图从政治上抹煞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阶级实质，断言在当代条件下矛盾的加剧“不存在于生产资料占有者和未分化出来的无产者之间，而存在于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机构中有决定权和无决定权者之间。”贝尔竭力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好象“工业化主义”的主要冲突在于“国家官僚制度”和“技术决定论者”之间，许多矛盾，其中也包括全球问题，正是由于这种冲突而加剧的。

阿尔温·托夫勒的两本书《关于经济痉挛症的报告书》和《第三次浪潮》是“后工业社会”的两曲绝妙的赞歌。他推论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缝隙中爬行，各种经济联盟和集团的寿命不长，旨在制止货币贬值和通过投

入专用外汇（石油美元）稳定从石油输出国取得石油的过程的措施没有成效。他的推论实际上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正处于新的“大萧条”边缘。托夫勒警告说：“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的不单纯是经济危机，而是在传统经济范畴内无法理解的某种深刻得多的东西”。他认为，早就应该明白，经济的病态变性是在社会的“非经济”活动范围内发展起来的现象的影响下发生的。

托夫勒的《关于经济痉挛症的报告书》以它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摆脱危机的出路的评价和建议而引人注目。他的观念的阶级倾向性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过渡战略”中，这种“过渡战略”是作为克服资产阶级社会危机状态的手段而提出来的。他认为，摆脱危机的出路在于向“改善的”、“超工业的”资本主义过渡。他的全部“战略”实质上归结为，通过首先是对经济建立“超国家的”监督来完善和稳定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托夫勒认为，当代的国家是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的、工业革命的过时产物。他把自己的视线转向跨国公司，因为他把跨国公司视作“全球经济重新稳定”和解决全人类问题的手段。托夫勒提出的措施丝毫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从他那应导致资本主义向“后工业”阶段过渡的斗争的实力分布图中可以看出：“一方是工业的昔日拥护者，另一方是认识到最迫切的世界问题（粮食、能源、军备监督、人口、贫穷、天然资源、生态、气候、老年保障、城市社会解体等问题）不可能在工业制度下得到解决的千百万人。”

托夫勒作为“增长阶段”论的信徒，竭力把人类的历史形容成相继更替的农业文明浪潮、工业文明浪潮和后工业社会文明浪潮。但是，社会的发展过程要复杂得多。在当代条件下，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政治利益各不相同而又相互影响的国家。托夫勒竭力回避对现实情况的分析，追求过份的概括，但书中的许多事实一清二楚地证明：依然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起明显作用；但已不决定社会发展基本趋势的资本主义国家，乃是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危机现象丛生的主要根源。托夫勒试图让资本主义充当文明“遗传密码”的唯一载体。他把文明的“第三次浪潮”和“后工业社会”作为人类的历史命运奉献出来。托夫勒替资本主义辩解和保护资本主义的意图耀然纸上：只是把一部分人固有的特点转移到全人类身上。从而蓄意把资本主义的那些对抗性矛盾强加给社会主义国家，托夫勒认为，这些矛盾只有随着过渡到“后工业”社会发展阶段才能得到解决。

“生态至上主义”流派 它把社会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问题提到首位，把注意力集中在人口、矿物原料和能源、粮食、人的健康、地球上动植物保护等问题上。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试图把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和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科学的某些原理综合在一起，并在这个基础上去认识具体的全球问题的实质。该流派的中心是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这是一个“独立的非赢利机构”，其宗旨是引起人们对全球问题的关注。该研究所出版的著

作具有下述特点：详细地分析全球问题的自然方面，认真研究技术进步的人为后果和人口增长动态以及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给生物圈造成的各种具体损失（矿物资源的枯竭、肥沃土地和动植物品种的减少）。

“世界观察研究所”的著作，一方面具有危言耸听的性质，目的在于唤起全世界广大舆论界对全球问题现状的忧虑，使之确信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去解决这些问题；另一方面，力图现实地评价事情的状况，承认如果不改正往日的错误和基本改善各方面的活动，不可能完全解决使人类忧心忡忡的难题。该研究所所长李斯特·布朗是制定该研究所全部设计方案的最积极参加者，是西方全球学的著名代表。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常常超越“生态至上”理论，有时甚至要去揭示一系列全球问题尖锐化的社会经济原因。这表现在他试图对社会给自然界的影响形态和这种影响对人类造成的后果进行分类。这种分类的第一级是对自然环境不断增加的“生态负荷”的物理表现：如世界牧场贫瘠、土壤侵蚀和气候变化的某些特征。布朗把这些负荷对经济造成的后果——原料不足、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停滞或衰退——列为第二级。最后，他把“前两级的紧张状态”所引起的社会和政治计划的消极过程和现象——饥饿、人口被迫流入城市、生活水平下降和政治动荡——算作第三级。

总之，布朗正确地评价全球问题出现的前提，指出当代形势的如下特点：“过去认为资源无限丰富，现在则意

识到许多资源长期匮乏。世界能源和蛋白质市场正从消费者手中转入供应者手中。七十年代初期明显地表现出来的这些变化和其它变化，证明我们正处于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急剧转折的边缘”。他把人口的形势和世界人口粮食供应的改善提到首要地位，呼吁制定包罗万象的、“突击的”减缓人口增长速度的计划。他们认为社会和自然相互联系的自然-生物方面是整个体系的中心因素。

布朗不仅讲到各种全球问题的相互联系，而且认为全球问题直接取决于当代的政治进程：地球上各种生物系统质量的降低不是仅仅使生态学家感到不安的次要问题。世界经济取决于这些生物系统。威胁着生物系统生命力的这一切，也威胁着世界经济……。如果不能停止各种生物系统质量下降的过程，不仅威胁某些国家的安全，而且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

“文明生存主义”流派 该流派的特点是以更开阔的视野看待全球问题的形成过程和某些国家以及世界范围内顺利解决全球问题实际对策的多样性。该流派的代表们在研究全球问题时考虑到了当代政治和社会经济的现实状况，并特别注意文化、宗教-道德观的发展。他们认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同全球问题形成的矛盾过程息息相关，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性质和倾向。在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人类要依靠这些改革着手解决全球问题。S. 门德洛维茨领导的纽约国际世界秩序研究所是该流派的中心。该所的第一个设计是“世界秩序模型设计”，参加这项设计

的有代表各国（其中包括美国、西欧、拉丁美洲、印度、日本）学者的若干个研究小组。

该设计的目的是揭示当代最尖锐的问题并提出防止战争、减少贫困和建立社会公正的途径和方法。该所编写的《关于建立公正的世界秩序》一书，反映了设计参加者对待研究问题的方法论观点和政治见解。根据设计领导人和该书编辑门德洛维茨的意见，一些全球规模的现代文明问题，诸如战争、贫困、社会不公正，生态不稳定和异化乃是三个历史过程——“思想革命”、科学技术革命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工业控制论革命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革命过去决定了人类向全球集团的转变，而当前则促进向全球管理的过渡。

“世界秩序模型设计”的作者和“文明生存主义”流派的其它代表们力图分析尽可能广泛的、促进全球危机现象加剧的各种过程和现象。他们断言，当今世界结构如此复杂，形式如此多样，以致单纯分析主权“国家”活动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思想方面是不够的，而资本主义作为社会经济体系是很有生命力的并处于摆脱“增长病”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设在新德里的发展中国家问题研究中心主任R·柯塔利正在研究沿“北—南”轴线改变世界秩序的可能形式和方法。他断言：“当今的人口和经济趋势正在加强现有的不平等和分歧，并正在促使世界进一步两极分化”。

“文明生存主义”流派的拥护者也在研究当代的基本